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研究*

劉德明**

摘要

本文主要是以楊樹達的《春秋大義述》為核心，論述楊樹達何以著成此書。並透過楊樹達的：稟承師志、抵抗日本侵略以及便於教學三個著書目的，分述《春秋大義述》在格式與內容上的特質。本文亦從楊樹達的「復仇」、「攘夷」二說，進而討論其不太引述《左傳》的原因，並不僅止於其所言《公羊》《穀梁》言義、《左傳》敘事的分別，而實是因為《左傳》在「復仇」、「攘夷」兩義的立場上與楊樹達有異的緣故。筆者也討論了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中對清末兩大公羊學者：蘇輿及康有為不同說法的態度與其立場。最後筆者從格式及內容兩方面討論楊氏《春秋大義述》一書的優點及其反省。

關鍵詞：楊樹達 春秋大義述 公羊學 攘夷 復仇

* 本文初稿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於 2008 年 11 月 6-7 日舉辦之「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第四次學術研討會，並感謝臺灣師範大學陳廖安教授於會中對本文許多錯誤的細心指正。

**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緒論

楊樹達(1885-1956)，字遇夫，為湖南長沙人，因好《荀子》中「積微者著」一語，因而自號積微。一般對楊樹達的學術成果討論多集中在「語法學、修辭學、訓詁學、語源學、文字學、文獻學、甲骨金文學、考古學」等方面。¹以 1985 年湖南師範大學為編著的《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為例，其書中論文絕大部份都集中在討論楊樹達在小學修辭等成就。²其書〈後記〉中亦強調「楊樹達先生是我國著名語言文學家，他在文字訓詁、語法修辭、古文獻整理校勘等廣泛領域內取得了卓越成就。」³這當然與楊氏自記在 7 歲時，即想將「訓義相同之字聚集為一編」⁴產生對文字小學的興趣，又與其日後著述多集中在此方向有關。但是研究楊樹達者往往忽略了楊氏的另一方面的成果——楊樹達對經部、子部典籍的著作。楊樹達除了在小學文字諸多著述之外，尚有《春秋大義述》、《周易古義》、《老子古義》、《論語疏證》、《淮南子證聞》、《鹽鐵論要釋》等書。在這些書中，楊樹達絕大部份是採順著書籍內容文字，或「採他說發明經義」、或「以事證經」，⁵加以詮解。尤其是《春秋大義述》一書，從格式上即可看出與其他諸書有絕大的不同，而楊樹達對《春秋》的理解也是少有學者加以討論的。⁶

其實楊樹達接觸到《春秋》的時間也很早，其於 11 歲時即開始讀《春秋左氏傳》。⁷在 1897 年，楊樹達 13 歲時，進入由陳寶箴、黃遵憲、熊希齡、譚嗣同等人合力創辦的「時務學堂」就讀，並受教於梁啟超。楊樹達日後回憶說：「梁先生用《孟子》及《公羊春秋》為教本，主張民權革命之說；學者思想為之一變。」⁸之後楊樹達從學於蘇輿，在蘇輿寫作《春秋繁露義證》時，楊氏「時時晉謁，先生頗以書中要義相指示。」⁹在楊樹達學有所成之後，先後寫成了〈左傳戴氏考〉、〈春秋宋世子痤有罪辨〉、〈公羊傳諾已解〉、〈春秋「公及莒人盟於包來」解〉、〈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解〉、〈讀左傳〉等單篇文章，討論《春秋》在文意、字詞上的相關問題。而楊樹達對《春秋》最重要的專著——《春秋大義述》一書，則是在 1939 年時，楊氏一方面覺得在日本侵華時無法為國盡力，另一方面「忽悟先聖之述《春秋》，以復仇、攘夷

¹ 此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楊樹達文集叢書》前的「出版說明」中的一段話。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² 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編：《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³ 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編：《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頁 325。

⁴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2。

⁵ 馬楠：〈楊樹達《論語疏證》與注疏新方法〉，《現代企業教育》，2007 年第 4 期下，頁 197-198。

⁶ 楊伯峻將楊樹達生平著作分為 6 類，此類是「輯古人之引文以釋古書」。見楊伯峻：〈楊樹達文集前言〉，收入《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頁 27。

⁷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3。

⁸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5。

⁹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春秋大義述附注》未刊稿釋文〉，頁 290。

為大義」，¹⁰所以「治《公羊春秋》，欲撰述條例，《春秋大義述》始此。」¹¹楊樹達此書初成時，將書稿示諸其好友曾運乾，曾看過之後「調哀舉大義，遠勝劉逢錄書，贊嘆不已。」¹²而章士釗亦贊稱此書「方法之佳」。¹³《春秋大義述》在1944年1月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後，在短短2個多月中即已賣出近800部，¹⁴當時得到不少的注意。但是弔詭的是，自1949年後，楊樹達的諸多重要著作均有重新出版，而只有《春秋大義述》一書直至2007才又重新印行。或許是因為這樣，所以學界對於楊樹達的《春秋大義述》較少討論，本文即是對此書及這些現象嘗試做一初步的探討。

二、《春秋大義述》的內容與特色

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的〈自序〉與〈凡例〉中，對其為何要寫此書有一完整的說明，綜合來說是三個原因：一、其鄉先輩魏源、蘇輿都對《春秋》深有所得，¹⁵尤其是蘇輿在生前並沒有完成其欲著的《公羊董義述》一書，¹⁶這或許讓楊樹達產生一種無可迴避的責任感。尤其從《春秋大義述》一名，更可想見其承師遺志的意圖。二、就時代因素而言，當時中日戰爭的氣氛日益緊張，楊氏認為自己必須負起一些責任，而著書自然成為書生報國的最好途徑。¹⁷三、為了教學上的需求。¹⁸楊樹達許多書籍都是因為其在教學上的需要而寫成的，楊樹達說寫《春秋大義述》是因：「乃以是經設教……又以是經大義散在諸篇，學者始習，艱於通貫。乃取諸大義之比近者，類聚而群分之……欲令學者力省時約，易於通解。每習一章，即明一義。」¹⁹可見《春秋大義述》從著作目的上來說，主要是著眼於令開始接觸《春秋》的人，可以快速明確的了解《春秋》的「大義」。

環繞著以上三個目的，《春秋大義述》一書亦分別對顯出以下幾個特色：

¹⁰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春秋大義述附注》未刊稿釋文〉，頁291。

¹¹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152。

¹²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153。

¹³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172。

¹⁴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214。

¹⁵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頁13。

¹⁶ 楊樹達在〈平江蘇厚菴先生墓誌銘〉中言：「初，先生既精治董生書，深窺其說《春秋》之旨，欲更為《公羊董義述》，以病劇未就，故學者尤痛惜之。」見《積微居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88。

¹⁷ 這兩點亦同時見楊逢彬：〈楊樹達的《春秋大義述》及相關未刊稿〉，收入《春秋大義述·附錄》，頁297-298。

¹⁸ 羅常培說楊樹達「每開一門課程就有這門的著述。」見羅常培：〈悼楊樹達（遇夫）先生〉，收入《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頁255。楊伯峻也有類似的看法，見〈楊樹達文集前言〉，收入《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頁27。

¹⁹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自序〉，頁6-7。

首先，從《春秋》學的傳統來說，《春秋大義述》的內容是直接以《公羊》為主，《穀梁》為輔，對於《左傳》之說則較為忽略。楊樹達對於歷來解《春秋》最重要的三傳，有「《左氏》詳於事，《公羊》、《穀梁》詳於義。」的評論，²⁰而《公羊》《穀梁》「二家之中，《公羊》立義尤精。故本編述義，以《公羊傳》為主，以《穀梁傳》輔之。」²¹由楊樹達從學於梁啟超及蘇輿的師承來看，他本來就對《公羊》學較為熟悉。加上清末民初《公羊》學大興，其說以《公羊》為主並沒有什麼值得訝異的。但是較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左傳》及《穀梁》的態度。因為清代的今文學家，多有對《左傳》的來源、是否解經等問題抱持著否定態度，如劉逢祿即稱「左氏為戰國時人，故其書終三家分晉，而續經乃劉歆妄作也。」²²認為《左傳》的「義法凡例出自劉歆偽造」，²³但是楊樹達卻不這麼認為，其言：

《韓非子》屢稱《左氏》，為《左氏》不出漢儒之堅證。余錄之，得二十餘事，中有全本《左傳》數條。²⁴

楊樹達不僅以《韓非子》中的資料來證明《左傳》並非漢人所作，而且甚至認為《左傳》的文字記錄較今文經更為可信：

樹達按：……襄公十三年取郛，《左氏經》作郛，而《公羊經》作詩。考彝器有郛公攄鐘及郛伯鼎，字作攄作郛，與《左氏經》合，知古經可信勝於今文經也。《古經》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杜注》謂單伯為天子卿。《公》《穀》二家經作逆王姬，二傳謂單伯為魯大夫。今按魯國卿大夫絕無以單為氏者，而周則屢見，彝銘揚 有司徒單伯，亦明是周卿士，此又古經優勝之一證也。²⁵

楊樹達在甲骨金文的成就極大，²⁶他運用民國以來學者常使用的以「地下新材料」與「紙上材料」相互印證對比的方法，²⁷判斷屬古文經之《左傳》並非如一些今文學家所說是漢儒所偽作，相反的也認為《左傳》中對於許多史事的記錄甚至較《公羊》、《穀梁》更加精確。²⁸至於楊樹達對於同屬於今文經的《穀梁傳》來源問題，並沒有太多論述，僅表示：「疑徐彥之言為得其

²⁰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頁8。

²¹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頁8。

²²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皇清經解本），卷1，頁1b。

²³ 楊向奎：〈清代的今文經學〉，收入《譯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347。

²⁴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37。

²⁵ 楊樹達：《漢書窺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3，頁214。

²⁶ 胡厚宣在〈胡厚宣致楊樹達〉信中說：「關於金甲小學，惟先生著作最富，發明最多，其貢獻之大，蓋突破以往所有之學者。」此信收入《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頁9。

²⁷ 「地下新材料」與「紙上材料」這兩個詞彙的相互對比最早是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的其所名的「二重證據法」中所使用，今借以說明。見氏：《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2。

²⁸ 大約也是因為如此，所以楊樹達並不認同皮錫瑞推崇劉逢祿之說，並說「劉書實無可取」。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155。

實，但誰著于竹帛，則不可考耳。」²⁹也就是說其大約同意楊士勛與徐彥之說，認為《穀梁傳》與《公羊傳》都是源自於子夏，而且都是「為經作傳」。差別在於《公羊傳》的傳承明白，而《穀梁傳》雖亦有自身的傳承之說，但由其在對「初獻六羽」解釋中援引「穀梁子」及「尸子」之說，楊氏認為《穀梁傳》為穀梁子著於竹帛之說並不可信而已。

雖然楊樹達認為在《春秋》三傳中認為《公羊》義說最為可信，但在《春秋大義述》中楊氏對《穀梁》、《左傳》的態度則與一般《公羊》家大異其趣：楊樹達基本上是兼採《穀梁》而少用《左傳》之說，對於《公羊》《穀梁》不同之處則盡力加以調和，其言：「《公》《穀》二傳義同者十居七八，亦間有彼此乖違者。今於其義同者盡錄之，其有兩義不同，可以並存不廢者，仍分別錄之。」³⁰楊樹達並舉出對《春秋》莊公4年中記：「紀侯大去國」一事，《公羊》《穀梁》的說法並不相同為例，表明其態度。此事在《春秋》所記諸多史事中十分有名，主要即是因為三傳對此事的評說差異頗大，³¹而《公羊》《穀梁》的說解方向更是南轅北轍，《公羊》說：

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³²

認為這是孔子在嘉許齊襄公能為九世祖齊哀公復仇。因齊哀公為紀侯所譖，以致於被烹於周，襄公滅紀實為復仇之孝舉。而《穀梁》的解說則完全不一樣：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³³

簡單的對比《公羊》《穀梁》的說法，即可知《穀梁》之意主要是在贊揚紀侯之德，與《公羊》之說大不相同。楊樹達清楚的了解這中間的差異，但在《春秋大義述》中則盡量的調停，不使《公羊》、《穀梁》之說有所衝突：

樹達按：紀侯大去其國，《公羊》謂賢齊襄，《穀梁》董生謂賢紀侯，義若相反。然

²⁹ 楊樹達：《漢書窺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3，頁215。

³⁰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頁8。類似的意亦見於《春秋大義述附注》未刊稿釋文）其言：「是編之作，以《公羊傳》為主，《穀梁傳》與《公羊》同義者載之，即義異不同而義可兩存者亦載之。」見《春秋大義述·附錄》，頁291。

³¹ 關於此事《春秋》三傳的差異及評述，請參見陳逢源：〈《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書義厘測及三傳異同之分析〉，《中華學苑》第45期，1995年3月，頁89-110。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以《春秋》三傳為重心〉，《臺大中文學報》第22期，2005年6月，頁99-150。尤其是頁121-128中，對三傳「紀侯大去其國」的說法有詳細的討論。

³²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仁宗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1985），卷6，頁10-11。

³³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仁宗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1985），卷5，頁8。

齊襄滅紀以復先祖之讎，紀侯死國以盡人君之道，義各有所歸，固可並存而不悖也。³⁴

楊樹達指出《公羊》賢襄公與《穀梁》、董仲舒賢紀侯兩者完全不相衝突，只是取義的方向不同而已，雙方之說可以「並存而不悖」。於此可以看出，楊樹達盡量調和《公羊》、《穀梁》的態度十分明顯，因為《穀梁》分明有「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文，小人指襄公，君子為紀侯，可見《穀梁》不但是在贊揚紀侯，亦同時斥責襄公，但楊樹達則完全忽略了《公羊》、《穀梁》這部份的不同。

其實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中盡量調和《公羊》、《穀梁》異說並不止此一例。又如其對《公羊》《穀梁》對桓公 11 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的解釋亦是一個很好的觀察點。此事為：莊公死後世子忽即位是為昭公，但公子突為宋莊公的外甥，宋莊公為了讓公子突成為鄭國國君，所以趁祭仲在宋時將他抓起來並以性命威脅要立公子突為國君。於是公子突就在祭仲的幫助下，從宋國回鄭國即位，是為厲公，而鄭昭公則出奔至衛國。對於此事，《公羊》說：「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³⁵認為孔子贊揚祭仲「知權」，這是因為：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³⁶

《公羊》認為若祭仲當時不順從宋莊公的話，不但自己難逃一死，昭公及鄭國亦不免破亡；祭仲就是因為考慮君主及國家的存亡，所以才暫時權變順從宋莊公之意，立公子突為君，以使鄭得以暫存。對於此事，《穀梁》之意則完全不同於《公羊》：「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³⁷《穀梁》認為祭仲根本是貪生怕死才會放黜昭公而立厲公，這跟保存昭公性命以至於鄭國根本無關，《春秋》在此是表達「惡祭仲」之意。其實《公羊》與《穀梁》的爭議點在於：祭仲當時之所以如此，其到底是為了什麼？若從祭仲前後的行事來看，其當時存心未必如《公羊》所判斷的純正。因為桓公 12 年、13 年鄭與宋兩國不斷相互爭戰，而在桓公 15 年時，厲公因懼怕祭仲專權，所以說服了祭仲女婿雍糾去刺殺祭仲。但旋即又因雍糾謀事不密以至於被祭仲所殺，之後祭仲還將雍糾的屍體陳列於周氏之汪以示威，鄭厲公在害怕之餘就出奔至蔡國。由這一連串的事來判斷，祭仲實為能掌握鄭國君主廢立的權臣，《穀梁》的說法亦非無因。³⁸可是面對《公羊》、《穀梁》如此大的差異，

³⁴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1，頁 29。楊樹達在〈凡例〉中說：「本書錄《公羊傳》於〈榮復讎篇〉，錄《穀梁傳》於〈貴得眾篇〉，並為說明，以祛疑惑。」（頁 8）事實上〈榮復讎篇〉及〈貴得眾篇〉僅止摘錄兩方說法，並沒有將此兩說並列說明。而在〈貴死義篇〉中才將兩方說法並列說明。

³⁵ (漢)何休解詁 (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5，頁 7-8。

³⁶ (漢)何休解詁 (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5，頁 8。

³⁷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4，頁 5。

³⁸ 三傳對祭仲評價的討論，參見張端穗：〈西漢《公羊春秋》首立學官之緣由--以祭仲事蹟之論述為焦點之探討〉一文，《東海中文學報》第 14 期，2002 年 7 月，頁 1-24。張端穗：〈董仲舒《春秋繁露》

楊樹達則僅言：「《公羊》謂祭仲知權，《穀梁》責祭仲不能死難，各明一義，並存之可也。」³⁹也就是說楊氏幾乎不去判斷《公羊》、《穀梁》之說誰是誰非，僅以兩方主張在義理上都說的通的方式來調和彼此的差異。由此可見楊氏在《春秋大義述》中雖以《公羊》為主，但其對《穀梁》之說亦十分的包容。⁴⁰

其次，從《春秋大義述》對《春秋》大義的內容理解來觀察，正如楊樹達的自述，此書最重要的也最明顯的「大義」當以「〈復讎〉、〈攘夷〉」二篇為首，惡倭夷，明素志也。⁴¹這與當時的時代處境相互關聯。不僅如此，《春秋大義述》中所暢言的〈貴死義〉、〈誅叛逆〉等條目，也是如是。⁴²此外如〈貴仁義〉、〈貴正己〉等 7 項大義，主要是在論述「修身養德之事」，因為楊樹達認為「根本不立，萬事皆隳」。⁴³其餘另以〈貴有辭〉、〈明權篇〉、〈謹始篇〉等等表述其所歸結出《春秋》的各種不同大義。⁴⁴事實上，早在司馬遷答壺遂之問時即言：「《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⁴⁵歷來《春秋》學者亦從各方面去解釋《春秋》中的「大義」。所以若從大的條目來看，《春秋大義述》中所述的各項《春秋》大義，大約都沒有超出前人的論述。如「復讎」、「攘夷」兩義，歷來說《春秋》者多有提及，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中並沒有提出特別的看法。

但進一步細究，《春秋大義述》中仍有一些較為特別的地方，這可分為兩個方面來說：一是有時對於個別事件、人物的理解與評價，楊氏與三傳及前人稍有不同：如楊樹達說「弦高矯君命以存鄭」是「《春秋》所許」。⁴⁶商人弦高因意外發現秦國軍隊想偷襲鄭國，所以謊稱受鄭穆公之命前來犒軍以拖延秦軍，才讓秦軍無法攻下鄭國。此事前後大家耳熟能詳，《春秋大

中經權觀念之內涵及意義》，收入其所著之《西漢公羊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頁 159-210。其實《公羊》對祭仲的稱許，連同屬《公羊》家的皮錫瑞都未必能接受，其言：「祭仲非真能知權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權之義。」（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春秋〉，頁 21。

³⁹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1，頁 35。楊樹達對祭仲的評價又見《春秋大義述》，卷 3，頁 118-120 的〈明權〉篇。在〈明權〉篇中，楊樹達引述多人的說法，論明《春秋》賢祭仲知權，甚至於引用了孔廣森批評「俗儒責仲當死」的說法。這應是比較接近楊氏真的見解。

⁴⁰ 楊樹達的這種態度或許是受到前輩的影響，因為他早在 1928 年 4 月 3 日謁見柯邵忞時，柯邵忞即告訴楊說：「治《穀梁傳》須打通《三傳》而不背家法。」楊氏對柯邵忞則是「執弟子禮」，楊、柯兩人雖一主《公羊》一主《穀梁》，但就不背家法之下盡量會通三傳的態度而言，兩人則是一樣的。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36 及 37。

⁴¹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頁 9。

⁴² 〈貴死義〉是因為可以「厲將士」。此外有人在「倭寇鴟張」之時，尚且「藉外援以叛國」，述〈誅叛逆〉之義主要在於「明眾怒，張天討」。見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頁 10。

⁴³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頁 10。

⁴⁴ 胡楚生在〈楊樹達《春秋大義述》析評〉一文中，對於《春秋大義》一書之篇目安排及對各項大義的彰顯均有詳細論述，本文在此不多贅述，請參見胡氏之文。此文收入胡楚生：《經學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 421-448。

⁴⁵ （西漢）司馬遷：《史記》（臺北：大申書局，1977），卷 130，〈太史公自序〉，頁 3297。

⁴⁶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3，頁 122。又見於卷 4，頁 196。

義述》在〈明權〉篇及〈大受命〉篇均提及此事，可見楊氏十分重視此事。但其兩處所引之《公羊傳》內容全同，僅有對此事的述敘，《公羊》並沒有提及對弦高的評價。《穀梁》及《左傳》中也沒有對弦高這個行為或個人有特別的評論，但楊樹達則特別指出弦高這個行為是「行權」，並將之視為「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⁴⁷對弦高這種評價是《春秋大義述》中特有的。

《春秋大義述》中對發揮《春秋》大義較為特別的第二點在於：楊氏對某些觀點的發揮較傳統說《春秋》者更極端，甚至偶有前人所未言的部份。在《春秋大義述》中有〈尊尊〉篇，熟悉《春秋》的人一定會聯想起《春秋》學中有所謂的「尊王」之說，楊樹達在此篇一開始亦即言：「分莫尊於天子，故戰則王者無敵，盟則王人序首。」⁴⁸事實上在這篇裡，楊氏的大部份說法與傳統《春秋》學者並沒有什麼差異。但是楊樹達也不是一味的主張尊尊而已，其亦援引董仲舒、司馬遷之意，說《春秋》有「貶天子，退諸侯」之義，⁴⁹並於其中大量引述《春秋》批評周天子及諸侯的例證，說：「知《春秋》固不以尊尊沒是非善惡之公矣。」⁵⁰持平而論，在強調「尊王」的同時亦有「貶天子、退諸侯」之說，在諸多說《春秋》學者的論述裡亦不少見，但楊樹達亦自覺在民國時主張「尊尊」之說，不免會受到某些批評，所以他在〈凡例〉中言：

或謂今日治為民主，《春秋》尊尊之義不適於今日者，此謬說也。抑知政體雖殊，治道無改。今之中樞，猶古之天子也；各省政府猶古之諸侯也……其異者，世爵與否耳。《春秋》譏世卿，今制固勝於古，而其道則未變也。試使省政府不受制於中樞……國事尚可為乎！昧者泥於跡象之異，達者知其事理之同。⁵¹

於此，楊氏想發明《春秋》之義以適用於今日的意思顯露無疑，其所提出的說法亦不無道理。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楊樹達提到一個說法——「譏世卿」，《春秋》中有所謂「譏世卿」之義，這是《公羊》家的獨特舊說，⁵²楊樹達亦引述用以說明從制度上來說，現今民主勝於古制，但「其道則未變」。問題是《春秋》「譏世卿」與民主的關連，莫說古人未言，在《春秋大義述》

⁴⁷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4，頁195。楊樹達在發揮孔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說時亦提到弦高的例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經也；弦高佯為鄭吏以犒秦，權也。國家存亡在呼吸之頃，如弦高以不在其位而不謀，則悖矣。」可見楊認為以《春秋》以弦高說明經與權的抉擇。見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202。

⁴⁸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4，頁167。

⁴⁹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4，頁183。

⁵⁰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4，頁187。

⁵¹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凡例〉，頁11。

⁵² 《公羊》在隱公3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中說：「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公羊》此說接受與批評者均多，見傅隸僕：《春秋三傳比義》（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頁34-41。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問題在於：《春秋》經文到底是如《公羊》《穀梁》所謂的「尹氏」，還是如《左傳》的「君氏」？以及《春秋》中到底有沒有「譏世卿」之義。

中亦不見任何論述，何以見得是古所「未變」之道？楊樹達在解《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時有論述到這個問題，他說：

樹達按：任重職大，有過於天子諸侯者乎？卿不當世，而謂君當世乎？卿當選賢，而謂君不當選賢乎？孔子譏世卿，實譏世君也。此《春秋》之微言也。⁵³

在此可以清楚的看到楊樹達對《春秋》大義的獨特發揮：他從「譏世卿」進一步的發揮天子、諸侯(即現今的中樞、省長)，其責任遠較卿為大；若卿不應世襲，那麼天子、諸侯也不應世襲。孔子「譏世卿」只是表面上的說法，其更根本的意思在於「譏世君」。由此，楊樹達說孔子是透過《春秋》「譏世卿」之說，實際上是贊成君要「選賢」。⁵⁴在這樣的脈絡下，說「其道則未變」是較為順遂的，但這實是楊樹達說《春秋》異於前人之說的地方，但《春秋大義述》中此類例子極少，而且往往在本書中並沒有明確的說明。⁵⁵

《春秋大義述》的第三個特色在於其對《春秋》大義的表述方式。如前文所言，《春秋大義述》在撰寫時即是為了讓人能快速的了解《春秋》大義，所以在形式上也與傳統《春秋》學家的著述不同。楊樹達言：

何謂「述」？「述」者，述經傳及傳記之文，自非萬不得已，則不下己意也……蓋《春秋》始隱訖哀，凡二百四十二年，一經大義散在各篇如上述，始學之士非孰讀全篇，再三孰復，不易得其條貫；⁵⁶

楊氏自言此書最初的名字為「述指」，是取《史記》「《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之義也。」之義，⁵⁷而後定名為「述」，取孔子「述而不作」之意。《春秋大義述》一書共分為5卷，其間由「榮復讎」至「言序」共提舉了29種《春秋》大義，楊樹達對每項大義都有簡要的敘述，如在〈榮復讎第一〉中，楊氏在文中列出《春秋》中無法復讎者或「譏」或「不書葬」等不同的評價外，還指出「家讎不可復」、「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及「朋友相讎，相衛而不相詢，古之道也。」⁵⁸針對不同關係對於如何施行復讎有一些界限的說明。又如〈言序第二十九〉中，楊樹達提出《春秋》中存在著：「先王命，則微者先於諸侯」、「疾首惡，則微國先乎大國」、

⁵³ 楊樹達：《論語疏證》，頁80。

⁵⁴ 與此相類，牟宗三對於《公羊》「譏世卿」之說與民主政治的關連有更明確的說法：「推政治之客觀形式而充其極，不但卿不可世，即天子諸侯亦不可世。故民主政治之出現亦人類歷史一大進步。」見是氏：〈公羊義略記〉，收入《寂寞中的獨體》（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185。

⁵⁵ 此外楊樹達對一般《春秋》學者多主張《春秋》興作必書，而且視為貶義有不同的看法。其言：「春秋時上不恤民，故孔子修《春秋》於築作多譏之……孔門師弟自對時政立言，非謂凡治國者不必改作也。漢以後人皆不知此義，殊可惜也。」見是氏著：《論語疏證》，頁261。但凡楊樹達此類對《春秋》獨特的看法，多不見於《春秋大義述》一書。

⁵⁶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附錄》，《〈春秋大義述附注〉未刊稿釋文》，頁292-293。

⁵⁷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附錄》，《〈春秋大義述附注〉未刊稿釋文》，頁291。

⁵⁸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1，頁6-7。

「外夷狄，則晉國先乎主會」等等書記原則⁵⁹。楊氏在說明《春秋》中存在這些「大義」後，再分別引述《公羊》、《穀梁》之說用以支持他的說法。即因如此，所以楊逢彬說此書的體例是：

將《春秋》中的「大義」分門別類，每一大義即為一篇；再以《春秋》經文及《公羊傳》的相關傳文為綱，以《穀梁傳》、《左傳》的傳文以及《荀子》和兩漢諸書中相關內容為目，彙集於該篇。⁶⁰

楊逢彬將《春秋大義述》的格式分為「綱」與「目」兩者來分析說明，實能明確指出《春秋大義述》在格式上的特質。但《春秋大義述》裡用「綱」與「目」來表達《春秋》大義並非是楊氏所首創，其亦分別各有來源，第一、在《春秋大義述》之前，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即是以分門別類的方式來陳述《春秋》大義。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目錄〉中即分有〈春秋愆〉、〈春秋例〉等 8 項。又在〈春秋微言大義〉項下有「經權」、「君臣」、「夷狄」等等諸多條目。⁶¹雖然從條目名稱來看，《春秋董氏學》中的大多條目與《春秋大義述》不同，但其做法則相當類似。雖然楊樹達晚至 1939 年 10 月 31 日才記有：「翻閱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將董生書分類鈔錄，在康氏著述中尚是較為平實者。」⁶²較 1939 年 7 月 23 日楊氏開始著述《春秋大義述》的日期為晚。但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是清末民初時享有大名的著作，楊樹達不可能在 55 歲前都未看過此書，所以《春秋大義述》以條目方式陳述《春秋》大義，應是參考過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第二、根據楊樹達自述，蘇輿在生前就跟他提過：「兩漢之學在《春秋》，故著者嘗欲取漢人文字涉及是經者薈萃為《春秋大義徵》一書，以便省覽。」但是「人事迫促，未遑卒業，叢殘之稿，遺在篋中。」⁶³依照這個說法，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中採集兩漢諸書的相關內容，用來說解《春秋》大義的做法無疑來自於蘇輿。⁶⁴綜合以上兩者，楊樹達的《春秋大義述》一書就形式而言，在歷史上諸多《春秋》學著作裡，的確是非常特殊的。而其優點亦在於可以將《春秋》「大義」分條表述，及提出諸多文獻以證成其說。正如其所希望的，這對於要快速了解《春秋》學或要推廣《春秋》大義來說，是極為簡便的書籍。

⁵⁹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5，頁 283-284。

⁶⁰ 楊逢彬：〈楊樹達的《春秋大義述》及相關未刊稿〉，收入《春秋大義述·附錄》，頁 299。

⁶¹ (清)康有為著，姜義華，吳根樑編校，《春秋董氏學》，收入《康有為全集(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631 及頁 788-794。

⁶²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154。

⁶³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附錄》，〈《春秋大義述附注》未刊稿釋文〉，頁 290。

⁶⁴ 因為蘇輿《春秋大義徵》的殘稿現無所見，所以也無從實際對比蘇輿與楊樹達之說的差異。關於現存蘇輿的資料見楊菁：〈導言〉，收入(清)蘇輿著，林慶彰，蔣秋華編輯，楊菁點校：《蘇輿詩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頁 1-50。

三、從《春秋大義述》看楊樹達的《春秋》觀

前文大略說明了《春秋大義述》一書的特點，接下來筆者擬從以下幾點，進一步由《春秋大義述》的內容來討論楊樹達的《春秋》觀，以期能對此書的立場有深入的了解。

首先就楊樹達詮解《春秋》的基本立場來看，其有個重要的預設：承續今文學家，尤其是《公羊》家的說經立場。前文已經論及，楊樹達說古文家「詳事略義」、「今文家重大義」所以才以今文家之說為主。這可以有兩個觀察面向：若從《春秋大義述》中引述《左傳》的部份來看，其所引述的大致上都是《左傳》的義說部份，如對襄公 21 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楊氏除了引《公羊傳》之說外，又引《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來說明《春秋》大義。⁶⁵又如僖公 20 年「春，新作南門。」楊樹達除了引《公羊》《穀梁》外，亦引《左傳》「新作南門，書不時也。」之說。⁶⁶類似的例子雖然不多，但從楊樹達僅援引《左傳》義說的部份來看，其確實是以「大義」為主，而非以「敘事」為主。但另一方面，若翻閱《春秋大義述》內容，則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在《春秋大義述》中，楊樹達除了引用《公羊》《穀梁》的義說外，更是常常連篇累牘的引述《公羊》或《穀梁》對於事件前後因果的敘述。這種情況十分普遍，只要略略翻閱《春秋大義述》一書幾乎隨處可見。面對以上情形，不免令人引發一個疑問：在事實上，《春秋大義述》並非排斥敘「事」，而且《左傳》中除了以敘事見長外亦非沒有大義，⁶⁷在這種情況下，為何楊樹達卻在書中少採《左傳》之說？楊氏所謂《公羊》《穀梁》重義、《左傳》重事的理由或可能只是表面上的說法，其背後應有更深層的理由。筆者認為這個原因仍在於楊樹達所認為的今古文的立場差異——只是差異點主要不在於解義或敘事的重點不同，而在於兩者對「《春秋》大義」的理解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正如前文所言，「復仇」與「攘夷」是《春秋大義述》裡最重要也最核心的兩個大義，但是這兩者恰巧都不是《左傳》所注重的。楊樹達在 1942 年 3 月 22 日記有：

襄公七年鄭伯髡原欲從晉，其大夫欲從楚而弑之。二傳賢鄭伯。襄公二十年，蔡公子變欲從晉，蔡人殺之。《左傳》譏變不與民同欲。二義正相反，知左氏不明攘夷大義也。⁶⁸

⁶⁵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1，頁 42。

⁶⁶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3，頁 143。

⁶⁷ 楊樹達也認為《春秋》有某些是「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的部份，以這個說法，其更不應排斥以敘事解經才是。見《春秋大義述》，卷 1，頁 54。又《左傳》一書的解經方式亦具有「論說經義」與「敘事經義」兩種方法，並非完全沒有義說。見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頁 69。

⁶⁸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183-184。

襄公 20 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在《春秋大義述》中沒有提及，而襄公 7 年鄭伯被殺之事則歸在〈攘夷〉篇。這兩件事都是因為鄭僖公、蔡公子燮兩人想要與晉結盟，最終被親楚之人殺掉。《公羊》《穀梁》都主張《春秋》在書記鄭僖公被殺時含有「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的意思。⁶⁹而《左傳》則沒有對鄭僖公被殺表示任何義說，甚至說蔡公子燮之所以被殺是因「不與民同欲也」。⁷⁰楊樹達認為從這兩個例子來看，《左傳》對於夷狄之辨根本不甚在意，這與楊樹達要強調「攘夷」之說是相互衝突的。此外對於《春秋大義述》的另一個核心——「復仇」，《左傳》的態度也是與《公羊》《穀梁》不同。對此，楊樹達並沒有明指，但就前文提及的「紀侯大去其國」等《春秋》有名的復仇例子來看，在三傳裡面，《左傳》是最不重視復仇的。李隆獻說：

若仔細省察三傳所呈現的復仇觀，亦可看出不同：《公羊》與《穀梁》基本上肯定復仇，《左傳》則似乎不贊成復仇。⁷¹

若以上兩點的看法是對的，則楊樹達在之所以在《春秋大義述》中不怎麼採用《左傳》之說，實在是因為《左傳》對《春秋》大義的理解，其基本立場即與楊樹達有一定的距離。

其次如前文所述，從《春秋大義述》中可以輕易的發現楊樹達所理解的《春秋》大義是以《公羊》學為主，這可從楊氏的自敘以及大量引用《公羊》、《春秋繁露》之說加以確認，也可以從《春秋大義述》中所引述前人的說法中得到佐證。楊樹達說《春秋大義述》中所引述前人之說以兩漢儒者為主，但是《春秋大義述》中除了漢代文獻外，較特別的是尚有引用了清代《公羊》學家孔廣森、陳立之說。⁷²自漢以下到清代，治《春秋》學者不知凡幾，楊樹達卻幾乎沒有引用這些儒者之說，卻只引用了孔廣森、陳立兩位清代今文家之說，楊樹達對自身學術立場的表達無疑是十分清楚的。從楊樹達的師承來看，梁啟超與蘇輿都算是清末《公羊》遺緒，所以楊氏以《公羊》為主亦可說是理所當然。但是蘇輿與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兩人對於《春秋》的看法卻是大相逕庭，這個差別或許梁啟超本人未必察覺，⁷³但楊樹達卻是很清楚：

光緒甲午、乙未間，南海康氏以經術塗附政治，為《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

⁶⁹ (漢)何休解詁 (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9，頁 11。(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勳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15，頁 7。

⁷⁰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仁宗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1985)，卷 34，頁 10。

⁷¹ 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以《春秋》三傳為重心〉，頁 134。

⁷² 如在《春秋大義述》的 17、97、119、239、281 等頁引孔廣森之說。在 133、173、254、255 等頁引陳立之說。

⁷³ 鄧國光說：「梁啟超以(筆者按：應為「似」)乎未知其師和朱一新有關『微言』與『大義』的紛歧，而於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亟詆其師『索於隱怪』的『妄者』、『僻者』，而刻意與其師相抗之事實，梁啟超似皆茫然無知；」見氏〈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初探〉一文，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285-286。

諸書，橫決武斷，略無友紀，先生見之而大非之，謂《春秋》之學不如是也，益取《春秋》及董生書潛心玩索，參伍比類，以求其實，成《春秋繁露義證》十七卷。⁷⁴

楊氏明確指出蘇輿之所以寫《春秋繁露義證》主要是針對康有為的《春秋》相關論述，而晚清的《公羊》學也不是僅有如康氏之說的內涵。⁷⁵若是如此，則楊樹達的《春秋大義述》的立場又是如何？乍看之下，楊樹達的立場似乎是比較偏向蘇輿；如其書名以《春秋》「大義」命名，即是意有所指：

何謂「大義」？大義者，碎義之反也……而說《春秋》者矜持「三世」之說，毛舉日月之例，皆所謂「碎義」也。⁷⁶

康有為與蘇輿一強調《春秋》「微言」一強調《春秋》「大義」，這是「康、蘇兩家各自標榜的旗幟」。⁷⁷楊樹達雖沒有直接指出康有為之說為「碎義」，但其強調「大義」的重要，也批評「三世」說之不當，從這點來看，楊樹達的立場應該是很明顯的。再者若從康有為與蘇輿另一個重要差異點——對孔子地位的看法——來做觀察。康有為將孔子視為改制的素王，蘇輿則雖然也尊崇孔子，但其僅將孔子視為「躬行君臣大義的聖人」。⁷⁸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中雖然也推崇孔子，但是絕對沒有把孔子視為主張改制的素王，而是視孔子為一藉由史實傳達大義的思想家。⁷⁹楊樹達對孔子地位的看法實是較接近於蘇輿而非康有為。

但是若進一步深究，則楊樹達的態度亦是十分值得玩味。因為楊樹達並非完全沒有「三世」之說的觀點，如其對孔子評論子路等學生的志願時說：「吾與點也」，解釋為：「樹達按：孔子所以與曾點者，以點之所言為太平社會之縮影也。」⁸⁰又於孔子評韶樂時說：

〈禮運〉以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為大同，大人世及謀作兵起為小康。……舜揖讓傳賢為大同之治，武王征誅及為小康。……小康始於禹者，以其傳子，創世及之制，違反選賢與能之道也。⁸¹

本來「大同」、「小康」之說為〈禮運〉所本有，但是以「大同」、「小康」搭配著不同的政治

⁷⁴ 楊樹達：《積微居詩文鈔》，〈平江蘇厚菴先生墓誌銘〉，頁 87。

⁷⁵ 盧鳴東及鄧國光均已提及清末《公羊》學並非只有康有為之說，蘇輿之說特意與康氏爭鳴。盧鳴東言：「《義證》代表了湖湘《公羊》學的經學特色，是常州《公羊》學以外的一棵奇葩。」而鄧國光則言：「蘇輿……以頡頏康有為的政見，釜底抽薪，摧陷康有為公羊學的理论根據。」盧文見：〈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以禮經世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7 月，頁 30。鄧國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初探〉，頁 269。

⁷⁶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春秋大義述附注》未刊稿釋文〉，頁 292。

⁷⁷ 鄧國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初探〉，頁 282。

⁷⁸ 鄧國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初探〉，頁 281。

⁷⁹ 在極少的情況下，楊樹達甚至會批評孔子。如其對孔子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說：「孔子此語似有輕教育之病，若能盡心教育，民無不可知也。以民為愚不可知，於是乃假手於鬼神以恐之……民決無不可知之理也。見是氏：《論語疏證》，頁 195。

⁸⁰ 楊樹達：《論語疏證》，頁 273。

⁸¹ 楊樹達：《論語疏證》，頁 80-81。

體制的說法，則無法不令人聯想到康有為的相關主張。雖然康有為的三世與不同政治體制的搭配在其前後期學說有所不同，在戊戌變法前後是指「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共和」，而在《大同書》中則是「人類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再到未來的理想社會。」⁸²兩相對比下，楊樹達之說雖未必全同康氏看法，但其論述脈絡則是一致的。⁸³而且蘇輿在根本上是反對「改制」為民主，而且視平等為「大亂之由」，並且主張維持君主專制等等。⁸⁴這些大約都是楊樹達所無法接受的說法。⁸⁵再者楊樹達亦曾明確的指出蘇輿對《春秋繁露》的理解是有所不足的，其言：

董生通《春秋》之學，為漢世大儒，《春秋繁露》一書，皆述《公羊家》說，而亦時時用穀梁義……平江蘇厚庵先生疏證《繁露》，至詳且精，於董生用《穀梁》義諸條，間有失證者，故縷析言之云爾。⁸⁶

指出《春秋繁露》共有 8 條採用了《穀梁》的意思，而蘇輿卻沒有發現，這本來可視為楊樹達的學養青出於藍的例證。但有趣的是，康有為卻早就指出《春秋繁露》裡間用《穀梁》義，康氏在《春秋董氏學》中即有〈董子口說與穀梁同出公羊外〉一文，其中並列出 5 條證據。⁸⁷對比康、楊之說，其中楊樹達所舉的前 3 條完全與康有為相同。雖然這也可能是英雄所見略同，但衡諸楊樹達「不掠人美，不飾己非」的為學習慣，⁸⁸及其豐厚的學養，楊氏不太可能不知或忽略康有為曾有此說。比較合理的推想應是楊樹達念及他與蘇輿的關係，所以刻意的不提此原為康有為之說。從這裡看來，楊樹達並不一味的偏向蘇輿或康有為的主張，而是兼取了康、蘇的看法。

最後，筆者擬從《春秋大義述》中最強調的「復仇」及「攘夷」兩點，觀察楊樹達的《春秋》觀。從文獻的角度來看，不論《公羊》《穀梁》兩家都說《春秋》中有「攘夷」、「復仇」大義，但是將這兩者視為《春秋》最核心的觀點則主要是宋儒的主張，牟潤孫即言「發明尊王攘夷之義為宋人春秋學之主流，餘事皆其枝節耳。」⁸⁹宋鼎宗亦言：

⁸²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 315。

⁸³ 順帶一提，陳其泰指出康有為的《論語注》是「以公羊三世說釋《論語》。」楊樹達在解釋時亦有類似傾向。見陳其泰：《清代公羊學》，頁 311。

⁸⁴ 鄧國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初探〉，頁 271 及 274-275。

⁸⁵ 以上論及楊樹達對「三世說」的態度並不見於《春秋大義述》一書，而多見於《論語疏證》。就論據而言，楊氏在《春秋大義述》中對於「三世說」的態度並不明顯。筆者對此的論述是基於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與《論語疏證》中應為一致的假定。

⁸⁶ 楊樹達：〈春秋繁露用穀梁傳義疏證〉，收入《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2007），頁 360-362。

⁸⁷ （清）康有為著，姜義華，吳根樑編校，《春秋董氏學》，頁 756-757。

⁸⁸ 李紹平語。李紹平還說楊樹達「對老師的看法，對同事乃至學生的見解，採用時必加申明。」見〈古文獻的整理大師〉，收入《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頁 246。如楊樹達亦曾自記：「翻閱《春秋屬辭辨例篇》（筆者按：應是清張應昌的《春秋屬辭辨例編》一書）。如余前撰〈再書狄人考〉之說，前人已有及之者。」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172。

⁸⁹ 牟潤孫：〈兩宋春秋學之主流〉，收入《注史齋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 141。

春秋大復讎之說，原出於公羊家，謂齊襄公之滅紀，為復九世之讎……而宋儒則一言之不足，至於再；再言之不足，至於三者……故儒者之釋春秋，屢以復讎為大義者，要皆在彼而不在此也。⁹⁰

論者以為宋儒不論強調尊王攘夷或復仇，其實皆與其當時的現實情勢息息相關，如宋鼎宗說：「若夫攘夷者，即抵禦外寇之侵略是也。」⁹¹宋氏的說法其實用來描述《春秋大義述》亦是十分合適。因為《春秋大義述》中雖將「復仇」列為第一，但其與「攘夷」幾乎是密不可分：因為有「夷」的入侵，所以才強調「復仇」。這樣的看法同時適用於宋儒及楊樹達。也因如此，宋儒的主張或許才對楊樹達撰寫《春秋大義述》有所啟發。因為一方面宋儒所處的歷史情境與楊氏類似，另一方面楊氏也認為「義理之說，宋儒所長。」⁹²而且從學術發展的脈絡上看，清代《公羊》學的重要人物莊存與也曾援引宋代理學來理解《春秋》，楊向奎言：

他(指莊存與)用以和政治理論相結合的不是傳統《公羊》學史觀，而是引進了宋代理學。這混淆了學統……以理學解《春秋》，這是新的「天人之學」，前所未聞。⁹³

再從《春秋大義述》的結構來看，楊樹達提舉了〈貴仁義〉、〈貴正己〉等 7 項主要是在論述「修身養德之事」的大義，並認為之所以要強調此事是因為「根本不立，萬事皆隳。」楊氏這種論述《春秋》大義的方式，實在是帶有相當濃厚的理學意味。

那麼楊樹達在《春秋》觀上最重要的看法「攘夷」說，其是否有超越前人之處？持平而論，不管在深度及廣度上面，楊樹達的「攘夷」說並沒有任何超出前人說法的地方。楊氏的攘夷說主要有兩層的意思：一、「《春秋》嚴夷夏之防」。⁹⁴這表現在《春秋》種種提及夷狄的書法上，如嘉許諸侯共抗夷狄、貶斥諸夏與夷狄結盟。二、夷夏之辨主要是以其文化與行事來判斷，所以若夷狄「行事進於中國，則進之」；⁹⁵「中國行乎夷狄，則亦夷狄之。」⁹⁶其中第二點更是「攘夷」說的核心，因為先有夷夏之辨才能談到夷夏之防。楊樹達的夷夏之辨主要是文化的區分而非種族區分的看法是很明確的，在《春秋大義述》中並舉《春秋》中書記「吳子」、「潞子」、「楚子」為例，說明夷夏之辨並非先天決定不可變改，而是透過其實際的行為加以界定。楊樹達又說：

《春秋》之義，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為夷狄，則夷狄之。蓋孔子於夷夏

⁹⁰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 191。

⁹¹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頁 167。

⁹² 楊樹達此語是因為張舜徽《揚州學記》一書將阮元之學分為「分訓詁、義理、考證、校讎、金石文辭六項言之」，楊樹達認為「義理之說，宋儒所長，阮君強說，要為無謂。訓詁考證，正是阮君擅長耳。」。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238。

⁹³ 楊向奎：〈清代的今文經學〉，收入《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327-328。

⁹⁴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1，頁 8。

⁹⁵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1，頁 19。

⁹⁶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1，頁 23。

之界，不以血統種族及地理與其他條件為準，而以行為為準。⁹⁷

楊氏以行為及文化來分辨夷夏並非是其獨特的看法，宋鼎宗言：

夫考諸先秦古籍，所謂「夷狄」者，斯有二義焉……此以種類殊異別也……此以文化高低分也。然則，所謂夷狄者，或非吾類，或無文化之種落之稱也。⁹⁸

以種族及文化兩種標準來區分夷夏，從先秦典籍中即已如此。遠的不談，楊樹達對於夷夏之辨所採取的態度即與其師蘇輿是一樣的，蘇輿說：「以此見中國夷狄之判，聖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⁹⁹「中國、夷狄，以德為準，《春秋》非漫然進夷狄。」¹⁰⁰都是以「行」、以「德」來判定夷夏。所以若只是單純的由夷夏之辨的概念來討論，則楊樹達之說並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他所強調的亦僅是前儒所常談的道理而已。但若更進一步來看，歷史上的夷夏之辨常常不僅只是單純的分辨夷夏而已，它常常摻入了現實的政治情勢的考量因而有了更複雜的說法，這在清末及民初時尤其更是如此。如魏源也以文化來判定夷夏，但複雜的是：

魏源判定夷夏的標準顯然是文化的，而不是地域的。他不僅承認夏有不如夷之處，而且主張師事夷人。這正是文化上的文野之分判定夷夏的結果……以文野之分辨夷夏，這並不是魏源的發明，而是夷夏之辨的固有之義……然而，在魏源的觀念中……在文化層面，他所認同的西人長技僅限於船炮技術，華夏文化之於夷狄，仍然有著無比的優越性。……此時的民族認同是與王朝、君主的認同糾纏在一起。¹⁰¹

在魏源的眼中，「夷、夏」主要對比的是西方的洋人與中國人。魏源雖然也以文化高低來區分夷夏，但在這個標準下當時何者為夷？何者為夏？則是個複雜的問題，因為它直接牽涉到當時清朝何如面對西方文化的問題。而且更複雜的還有：清朝的統治者在傳統漢人眼中或許也是「夷」，於是對夷夏問題的態度在清末時又常常與對清朝的態度彼此關聯在一起，鄭師渠言：

國粹派對「春秋大義」的概括，最集中最鮮明的一條，無過於「內諸夏外夷狄」……作為排滿革命宣傳的健將，國粹派刻意彰顯「攘夷」為「春秋大義」，是合乎邏輯的。不僅如此，他們還進一步強調「春秋大義大復仇」。……與國粹派相反，康有為諸人站在清廷的立場上，尤其反對這一點。他們強調，《春秋》有「進吳楚」之說，可見聖人不薄四夷……同時，「匹夫任俠殺人報仇，是為亂民」，遑論「復九世之仇」？¹⁰²

這裡所謂的「國粹派」是指「學術界歷來用以專指革命派內部以章太炎、劉師培、鄧實等為代表力主保存國粹的一派人。」¹⁰³這些國粹派學者對於夷夏之辨的看法顯然不同於蘇輿與康

⁹⁷ 楊樹達：《論語疏證》，頁 67。

⁹⁸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頁 167。

⁹⁹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2，〈竹林第三〉，頁 47。

¹⁰⁰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9，〈觀德第三十三〉，頁 272。

¹⁰¹ 賈小葉：〈1840-1900 年間國人「夷夏之辨」觀念的演變〉，收入鄭大華、鄧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 301。

¹⁰² 鄭師渠：《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頁 342-343。

¹⁰³ 鄭師渠：《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頁 8。

有為，而康、蘇兩人對於《春秋》的理解或許有很大的差異，但是他們在以行為、文化來界定夷夏這點上卻是相同的。以上關於《春秋》中夷夏之辨的諸多問題與討論都發生在楊樹達撰寫《春秋大義述》之前，¹⁰⁴這些本來或許可以形成一個很好的參考點：讓夷夏之辨這個古老的命題能有更深及更完整的論述。但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裡對這些問題完全沒有觸及，其仍僅以最原始及單純的《公羊》、董仲舒之說為主來論述。綜觀《春秋大義述》的攘夷觀，其或許與前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不將「夷」僅指向中國夷狄或西洋人，而是用以指射某些日本人、希特勒、東條英機而已。¹⁰⁵

四、結語

楊樹達的《春秋大義述》並非是楊樹達最有名的著作，其影響也不大，所以討論的人也不多。但是筆者仍盡力鉤勒出其著作的大要及其背後的立場，也試圖反省其問題所在。筆者認為關於《春秋大義述》的價值可由以下兩點觀察：

從體例來說，《春秋大義述》當然是一本很好的《春秋》入門書，尤是要對了解《公羊》或董仲舒對《春秋》大義的理解來說更是合適。因為楊氏已經將大義條列出來，也將相關資料分門別類整理在每個條目之下。讀者只要由〈榮復讎〉讀下，便會對於《春秋》中種種「大義」了然於心，對儒家所強調的德目亦會有基本的理解。這對學者而言無疑是十分方便的，尤其是與歷代來繁複無比的《春秋》注解相互對比，《春秋大義述》在體例上的優點更加明顯，因為楊樹達已為讀者做了很好的歸納及檢擇的工夫，讀者就不必在層層迷障中去追尋那縹緲不定的《春秋》大義。

但就內容而言，《春秋大義述》對於相關問題的論述就顯得不夠深入。這可以分成兩點來說。首先楊樹達對於《春秋》學中本有的問題並沒有試圖加以討論、解決。例如就離《春秋大義述》一書撰寫不久前，關於古史真偽問題曾引起學界熱烈的爭論，其中關於《春秋》是否為孔子所做也有許多學者討論，但楊樹達對此完全沒有提及。又如《春秋》有大義是儒者通說，問題是如何在一條條的記錄中將大義解讀出來？在《春秋》學史上不同家派的學者各有不同的主張，例如《公羊》《穀梁》學者都承認有所謂的「日月例」，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孔子要透過記時日月缺略的方式來表達其是非善惡褒貶的評價，甚至有人更進一步發展出記日也

¹⁰⁴ 在清末民初的華夷之辨所產生的問題很多，詳見賈小葉：〈1840-1900年間國人「夷夏之辨」觀念的演變〉，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頁301-307。民國後因中日爭端亦引起許多學者大量討論民族主義相關問題，參見張太原：〈建立一個民族國家：自由主義眼中的民族主義〉，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頁257-263。

¹⁰⁵ 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卷一的第一個註即批評「倭奴之犯我遼寧，侵我盧溝，襲擊美國之珍珠港，皆詐戰也。」見《春秋大義述》，卷1，頁61。楊樹達又言孔子「其生在二千數百年以前，恍若豫知數千年後有希特勒、東條英機等敗類將持其民族優越論以禍天下而豫為之防者，此等見解何等卓越！此等智慧何等深遠！」見《論語疏證》，頁67。

是表達褒貶的一種說法。對於這種說法，楊樹達直接認定是不可信的，他說：「以《春秋》所書月日，皆有褒貶之意存乎其間。此說不甚可信。然傳文屢言之。」¹⁰⁶但問題是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裡仍然常常引述《公羊》《穀梁》以日月有褒貶之說來說明《春秋》大義。楊樹達對於《春秋》學裡這個重要的問題完全沒有任何討論。其實《公羊》《穀梁》學者之所以能夠詮解《春秋》，除了師承上的權威外，他們還說《春秋》中有許許多多的「書法」，透過這些書法方才可以了解孔子的大義。楊樹達在《春秋大義述》裡也接受了這樣的看法，也沒有對這個問題有任何反對的意見。但是在 1953 年楊樹達 69 歲時，有一段特別的記錄：

刪去《小學述林》說《春秋》義者三篇，寄科學院出版。審查意見謂今日討論《春秋》書法為無意義。此說甚是，故從之也。¹⁰⁷

楊樹達為了《小學述林》能順利出版，所以刪去了原來三篇有關《春秋》的文章，¹⁰⁸更重要的是，此時楊樹達已經接受審查意見中「今日討論《春秋》書法為無意義」的說法。¹⁰⁹如果依照這個說法，則楊樹達在晚年時大約已不認為《春秋》中有「大義」，若是如此，其自身對於早年所著的《春秋大義述》亦應不會有太高的評價。

由此而來，筆者對於《春秋大義述》在內容上的第二個反省則是：就此書之所以著成的原因來看，楊樹達「憤於國難」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春秋大義述》中也可以明顯的看到，楊樹達或許是為了當時能直接鼓動民心，所以對許多《春秋》大義僅有標題式或單純依循傳統之說，而沒有繼續深入的論述及闡發其間所蘊涵的問題。也就是說楊氏在當時主要的目的並不在對《春秋》作一文獻式或專家式的研究，而是以《春秋》做為支持其所深信道理的宣傳。職是之故，其對於《春秋》中許許多多的已然有許多成果及引人懷疑的問題並沒有任何討論，因為那些討論都與楊氏當時著書的目標未盡相合。在此我們或必須承認：也許不是所有著作都只為同一目的或以同一標準而寫，同一作者在不同時代環境下產生的作品可能負擔著不同的任務。楊樹達在 1939 年撰寫《春秋大義述》前後曾與曾運乾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答：

曾星笠來談，以〈易牙〉文示之。星笠云：「顧氏《日知錄》雖事考證，必先有一主旨在胸。若其考證無益於世道人心，不為也。此文與顧氏宗旨相合，故為佳文」云。余笑謂余為文時初無此意，得君說而余文增重矣。近人喜云為學問而學問，與星笠所言不合。然其言自有此見，不可厚非也。¹¹⁰

¹⁰⁶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 1，頁 62。

¹⁰⁷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359。

¹⁰⁸ 筆者對比《積微翁回憶錄》與楊樹達的文集，猜測這三篇可能是〈春秋宋世子痤有罪辨〉、〈春秋「公及莒人盟於包來」解〉及〈讀春秋傳〉。

¹⁰⁹ 當然楊樹達之所以接受這個說法未必完全是學術上的見解，亦有可能是政治上的壓力。如在當年(1953)陳寅恪就因〈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這篇文章與當時主流觀點不同而被抽稿，而楊樹達的《積微居金文說》的出版過程亦有些許波折。詳見蘇耀宗：〈陳寅恪〈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抽稿管窺〉(上)(下)，《大陸雜誌》第 104 卷第 4 期、第 5 期，2002 年 4 月、5 月，頁 42-48 及頁 21-42。

¹¹⁰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 154。

所謂〈易牙〉文指的是楊樹達的〈易牙非齊人考〉，主要是從易牙食子的行為來論證易牙為狄人而非齊人，這本是古代文獻考訂的題目。但楊樹達清楚知道曾運乾所謂考證必須有益於世道人心的看法，雖然與當時的「學問」觀不同，但仍認為「自有此見，不可厚非」。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那麼《春秋大義述》的最大價值已產生於在中日戰爭方熾之時，其書對於當時之人心士氣有所鼓舞，亦即為此書之目的。而後時空改易，所非所是莫不與當時情狀有頗多相異之處，故而人們忽視與不甚注意此書，或即為情理中事。

